

从大观园斗嘴，到互联网“好的”

□陈笠

【编者按】陈寅恪先生曾说:“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,更是历史的活化石与社会心理的投射。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汉语,却往往忽视了其中蕴藏的奥秘。《夜晚的语言学家:发现汉语的100个秘密》一书透过日常语言现象,挖掘其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、社会心理与语言学原理。在此选摘书中关于“社交”的部分内容。

“我们”不能随便说

人与人的交流方式是由社交关系决定的,包括水平的亲疏关系和垂直的权势关系。权势关系由年龄长幼、辈分高低、地位尊卑、职级上下等因素决定,由于几千年来等级制度和伦理规训,汉文化特别注重体现权势关系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一回,袭人和晴雯发生争执,袭人道:“好妹妹,你出去逛逛,原是我们(袭人和宝玉)的不是。”晴雯听罢,抓住“我们”二字加以讥讽:结果回旋镖也扎到了自己身上——第六十三回,晴雯对平儿说:“今儿他(宝玉)还席,必来请你的,等着罢。”平儿笑道:“‘他’是谁?谁是‘他’?”

宝玉与晴雯,袭人之间都是尊卑关系,后者应该使用“宝二爷”“二爷”等尊称;而使用“他”“我们”则是把自己和宝玉放在了平等关系中,透露出双方超越主仆关系的亲密,所以被听话人抓到小辫子。

封建时代的权势关系尤其体现在自称上面。下对上以自称,或视身份用谦称“臣”“妾”“奴”“愚”“仆”“下官”“小的”等;一般只有上对下或者关系亲近的平辈间才自称“我”。很多小说善于通过炮制称谓去强化阶级等差感,比如后宫里的尊称分“小主”和“娘娘”,自称分“婢妾”和“臣妾”。

为了兼顾权势关系和情感关系,大量使用了拟亲属称谓。比如“爷”最初是称父的,后来它被外化为对尊者的称呼,谦卑恭谨中又有一丝套近乎的谄媚。“大人”同样如此,它本是称呼父母长辈的,后来“大人”用作了对

官员的尊称,而“父亲大人”“母亲大人”反让人误以为是移用了对官员的称谓。

“请大家洗耳恭听”是个笑话

不同的权势关系还匹配不同的动词。通知、吩咐、指点、培养、宠爱,这些词隐含的是高权势对低权势的关系图式;叨扰、拜访、请教、敬重、爱戴,表现出低位对高位的尊敬态度;探讨、分享、商量、交流则是平等关系。

中国文化讲究尊人卑己,说话人即使在平等的关系中也习惯以低位者的口吻讲话,构建向对方倾斜的权势关系。比如自称“鄙人”,自己的观点叫“愚见”,对方的观点叫“高见”,对方听自己的观点叫“垂听”,问对方问题叫“请教”。汉语中的谦辞、敬辞非常多,需小心使用,避免因搭配不当,成了尊己卑人。像“请大家洗耳恭听”就是把谦辞当敬辞用了。

客服为什么喜欢说“哒”“哦”“哈”

互联网时代,大部分对话迁移到线上,以文字的形式发生,说话者为了使对方能通过文字感受到自己的语气和情绪,就会更加依赖语气词。

比如领导布置任务,回复“好”显得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人,而“好的”应感知更强,“好咧”“好哒”“好呀”“好哇”“好的呢”则更加热情。

网上购物时,客服会习惯性在每句话末尾加上“哒”“哦”“哈”等表达友善的语气词。

有学者统计,女性比男性更加喜欢使用



《夜晚的语言学家:发现汉语的100个秘密》陈笠 著 海峡书局

语气词。学者通过分析口述实录文学《北京人》发现,在疑问句中,“吗”“呢”“吧”“啊”等语气词在女性中的使用率大大高于男性;女性的82句话中,语气词出现59次,平均使用率为72%;男性的141句话中,语气词出现46次,平均使用率为33%。而在祈使句中,女性使用语气词的频率(平均为48%)也大大高于男性(平均为28.5%)。

问句中以“嘛”代“吗”也是权势心理的作用。原本“嘛”“吗”是截然不同的语气词,一个传信,一个传疑:“明天聚餐,你来嘛”是让你来,“你来吗”是问你来不来。但是人们在提问时,尤其是在下对上的关系中,常会担心自己的语气太硬、不够礼貌,所以喜欢把“吗”换成语气更软的“嘛”。其实,这样反而增加了沟通成本,因为“嘛”的本职功能是用陈述句、祈使句,以“嘛”作为语气词,受话人需要反应一下才能确认这是个问句。如果要将“你来嘛”明确为问句,就需要加上问号,原本一个“吗”字就能传达的意思,现在要一个字加一个标点符号才能办到,这是对汉字自身表意功能的稀释。

“吗”“嘛”混用会增加歧义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)也明确规定“嘛”不用于疑问句。礼貌固然是沟通时的重要原则,但或许不宜建立在破坏语法的基础之上。



《消失的物种:揭秘大海雀的灭绝》[冰岛]吉斯利·帕尔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然而,大海雀种群健康稳定,无大规模病害、无栖息地自然崩塌、无天敌泛滥;是人类无休止的商业捕猎与肆意掠夺,让这个种群一步步走向绝境。这不是自然的淘汰,是纯粹的人为扼杀。一个存续千万年的物种,可能只需几十年甚至数十年,就会在人类的干预下彻底消失。

如今,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,看着博物馆里冰冷的大海雀标本,重读百年前的科考手记,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,从来不只是一个物种的消逝。

时代滚滚向前,技术日新月异,而人性的发展往往缓慢和迟滞。《消失的物种:揭秘大海雀的灭绝》以严谨的史料为根基,依托约翰·沃利和阿尔弗雷德·牛顿留存的珍贵科考手记,按清晰的时间脉络,梳理了大海雀灭绝的完整历程,为我们完整还原这段沉重又遗憾的历史。它不只是一本记录物种灭绝的科普读物,更是一本警醒世人的生态启示录,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触摸到生命的重量、历史的厚重。

灭绝大海雀:生态史上不该遗忘的一页

□晓杨

北极也曾有“企鹅”

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,企鹅是独属于南极的精灵。其实很多年以前,清冷的北极海域,也曾生活着一群通体黑白、体态笨拙的“企鹅”。它们就是大海雀。

1844年的夏日,冰岛埃尔德岛,最后两只大海雀在孵蛋时被捕杀,最后一枚尚未孵化的鸟蛋在意外中被损毁。自此,北极再无大海雀。

放弃了飞行的能力,是大海雀在漫长进化中的自然选择;但那双短小的翅膀,让它们在海洋中自在穿梭,成为北大西洋最出色的潜水者。它们群居而生,性情温和,没有攻击性,日复一日在孤岛栖息、繁衍、哺育后代。

大航海时代开启后,水手们发现了这种体态肥硕、行动迟缓、极易捕捉的海鸟。它们肉质鲜美,油脂丰厚,羽毛柔软珍贵,不仅能为远航的船只补充新鲜食物,羽毛还能用来填充枕头、装饰帽子,于是,它们成为极具经济价值的贸易商品。

宁静的孤岛沦为血腥的捕猎场。人类的捕杀,从最初的零星获取,逐渐演变成规模化、商业化的掠夺。大海雀不善逃窜,无自保之力,面对人类的利器与贪婪,只能被动承受。种群数量以惊人的速度锐减,到19世纪中期,全世界的大海雀,仅剩冰岛埃尔德岛的零星几只。

可悲剧并未就此止步。稀缺性催生了更高的利益,大海雀的标本、鸟蛋成为欧洲贵族、收藏家争相追捧的珍品。越是稀少,越是疯狂捕猎。1844年,三名渔民登上埃尔德

岛,找到了地球上最后一对大海雀。这对大海雀夫妇正在孵蛋。面对人类的逼近,这对大海雀没有仓皇逃离,反而张开短小的双翼,护住身下的鸟蛋。但在食欲面前,所有的生命坚守都不堪一击。两只大海雀被捕杀,鸟蛋被碾碎。这个存活了几十万年的物种,彻底宣告灭绝。

大海雀亡于人类愚行

1858年,在最后一对大海雀被捕杀后的第14年,英国知名鸟类学者约翰·沃利和阿尔弗雷德·牛顿,专程奔赴冰岛开展科考,想要采集大海雀标本。他们一无所获,再也寻不到一只大海雀的身影。

这场迟来的探寻,终究成了一场迟到的救赎。在此次探险过程中,他们采到了当年参与捕杀最后的大海雀的渔民,详尽记录了他们的证词,并整理了关于大海雀生存状态、灭绝过程的全部线索,撰写成五卷本的《大海雀书册》。

这份珍贵的科考资料留存至今,手写原稿完整保存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内。它完整还原了1844年最后一场大海雀猎杀事件的全部细节,是后世所有大海雀物种灭绝故事的母本。

在大海雀彻底消失之前,人类对“物种灭绝”的认知浅薄又傲慢。彼时的世人普遍认为,物种灭绝是遥远且不可能发生的事,即便有物种消亡,也不过是自然法则的正常运行,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,与人类行为毫无关联。伟大的分类学家卡尔·冯·林奈和达尔文都持这种观点。

快览

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技术引进史料选编》
杨芳 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



“改革开放史料丛刊”的第一本。本资料选编的历史文献时间段为1979—1990年。它不仅涉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性文献,而且提供了许多企业的调查报告、总结材料、发言讲话,按照技术引进的内涵大致构成了一个史料“链条”,呈现出技术引进初期的具象史实以及其复杂性、多面向。

《旧醋年华》

翟永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从喇叭裤、“的确良”衬衫到坝坝电影,从手抄本到禁欲时期的爱情,中国当代诗歌文学绕不开的人——翟永明,回望20世纪70、80年代,用15篇文章,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,编织成一部私人又共通的成长诗篇。书中配有数十幅作者的青春旧照、老电影海报与纪实摄影。

《我的婚礼:上海市民婚礼七十年口述》
上海通志馆 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通过近50位口述者对自身婚礼记忆的回顾,讲述了自1950年至2024年的婚礼故事,呈现了70年来上海市民在婚礼形式、物质生活、住房条件、家庭关系、审美观念和婚姻态度等方面的变化。亲历、亲见、亲闻,无数微小的声音,汇聚成集体记忆。

《夜奔:客栈里的武林》
黄鸿鸾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作者自幼习武,2011年在北京创办以“武术”为主题的四合院民宿“夜奔北京”,欢迎四海“武林人士”入住交流。一时间,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纷至沓来,小院“一房难求”,名震国际武侠界。后又相继创立了“夜奔大同”“夜奔平遥”。本书即作者多年来经营“夜奔”客栈的奇闻异录。

《大树》三部曲

[美]布莱恩·塞兹尼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一部关于生命、时间与爱的史诗。两颗比指尖还小的种子,在恐龙横行的世界里寻找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——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,却要穿越火灾、深海、火山、小行星撞击,跨越亿万年的时光。通过一个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,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古生物学、植物学、生态学等领域的知识。

《勇气呼唤勇气》

[英]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

本书生动讲述百年前英国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抗争历程,当年最勇敢的参与者是那些最辛苦英国女工。本书不只是复盘过去,更是前瞻未来:叩问人工智能、数字产业下女性被物化、被边缘化的未来危机,为数字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考维度。
(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)

·郭梅说剧·

“名人剧”遇上文旅融合

□郭梅



郭梅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,副剧评人、作家。

近年来,以苏东坡、王阳明、朱熹、徐霞客等历史文化名人为核心的舞台作品持续升温。演出空间从剧场延伸到各式各样的景区,其艺术形态也从传统的话剧、戏曲、舞剧、音乐剧,逐渐拓展到山水实景演出和沉浸式戏剧。这一现象说明,文旅融合正在转向讲述地方文化故事和塑造地域文化形象。如果进一步追溯还会发现,相当一部分“名人剧”,本身就是文旅的一个项目。

文化名人是连接历史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天然媒介。王阳明与贵州龙场和浙江余姚、绍兴,苏东坡与黄州、四川、杭州和海南,徐霞客与云南保山,朱熹与福建武夷山,都具有十分明确的地域联系。通过人物的生命经历、思想成就和文学作品,可以把原本静态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可观看、可感受的故事。如《江清月近人》借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展开诗意叙事,并采用环岛行进式观演;《不止三月下扬州》则把扬州瘦西湖的园林、民俗和李白、苏轼、郑板桥等历史人物结合起来,使游客从观景者转变为文化情境的参与者。

这类作品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加亲近当代观众的传播方式。京剧《阳明悟道》、姚剧《王阳明》、川剧《梦回东坡》和越剧《苏东坡》

·序跋集·

九十年后还有人写、还有人读

□谢华



摘编自谢华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后记。

过去在长征胜利六十、七十、八十周年时,我写过一些这方面的作品。自2021年建立“红色报刊史料研究中心”,集中研究红色报刊,亦研亦学亦作,渐渐这种题材的作品也就多了起来。今年时逢长征胜利九十周年,将这些作品整理出来,出一本集子,也是我们中心成立五周年推出的一个好产品。

第一次认真了解长征,是小时候听老师讲的。他讲的也是听来的,或者说看来的。记得他说,那些人太苦了,苦得没法说。他讲得很简单,翻一座山死了多少人,过一条河又死了多少人,讲着讲着就不讲了,抽烟。我那时候小,不懂他为啥不讲了。后来我长大了,自己去查史料,看回忆录,看到那些细节,忽然就懂了。

写这些诗的时候,我尽量用简单的词。我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绕的写法,或者用较为晦涩的词语。长征本身就是朴素的,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,没有任何花哨。我觉得写它的诗也应该是这样,像说话一样,像走路一样。

我重走了部分长征路。站在那些地方,看看那些山,那些水,想象一下九十年前那支队伍从这里经过,心里还是会有东西涌上来。在泸定桥,铁索还在,晃得厉害。我扶着

·无限杂思·

从“我可以”到“我不想”

□刘洪波



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。长江日报评论员,高级记者。

近年,围绕韩炳哲“绩效社会”的讨论可以说蔚为大观,福柯的“规训社会”似乎已经过去,至少作为学术热点是这样。

其实,规训社会也好,绩效社会也好,应该都只是资本体制中资本治理的技术,它需要治理对象的配合才能发挥作用。而治理对象去配合规训或者绩效的内在驱动,在于“自我实现”,其中消费主义是自我实现的重要体现。

规训或者绩效,都是效率主义的技术马甲。它们也都实现了对时间的全部整合,包括生活的时间与生产的时间,时间计量成为“经济度量单位”,也成为“道德度量单位”。

不过,规训的技术通过“纪律性”来实现普遍的组织,它是一种外在的否定性暴力,让你不能不接受;而绩效社会是通过“激励”来调动主动融入整体结构的状态,它是一种自身的肯定性暴力,让你对自己要求高一点、状态好一点。

从资本体制的现状来说,我们不能说这两者相互排斥。规训并没有退场,它仍在起到基础性作用,或者说它仍然是资本体制的“保底”措施。但在很多时候,人们也确实已被塑造造成优绩主义的信众,成为一个个绩效主体。

绩效主体不仅是绩效考核的接受者,而且是优绩主义的拥趸,相信依靠自身绩效的提升,可以创造个人幸福。人们既相信机器开得快一些,就可以使每个人生活更美好,从而都去适应机器;也相信自己跑过其他人,就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。本质上,这也就是人们把自己和他人鄙视同效率机器,完成了对人的“机器化”视角转换。

绩效主体的成功打造,营造了一种从“你不准”到“我能够”的主动精神。人们主动寻求“心灵鸡汤”“励志故事”,自我激励,自求出路,自己加压,为了在绩效竞赛中先拔头筹。

绩效主体创造了一种“自我剥削”的劳碌景象。不再是“要我干”,而是“我要干”,主动加班,主动“充电”,主动考证,主动上进。绩效竞争的对象既是特别的、具体的、同事、同学,坐在同一间办公室、奔忙在同一个展销会;又是普遍的、抽象的,整个社会竞争者无处不在。

人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个绩效主体呢?优绩主义固然通过高分评价使人产生荣誉感,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允诺了一个“通过优

等,借助地方戏曲保存地域审美;舞剧、音乐剧和沉浸式演艺则更容易吸引年轻观众。另一方面,文化名人剧能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,丰富夜间消费,推动景区由单纯的看景转向全天候全方位的体验。如《金声玉振》将孔子文化和景区空间相结合,成为尼山圣境的重要文化内容;《国秀·琅琊》等项目则以演艺带动古城整体场景建设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在这个过程中艺术逻辑与文旅逻辑会不会出现失衡?当创作起点是“塑造城市名片”,就可能优先放大大人物身上符合地方正面形象的部分;人物的争议、性格缺陷、复杂的灰色面会被修剪、弱化,甚至直接过滤;人物变成地方精神的“代言人”,而不是一个有矛盾、有软弱、有局限的活生生的人。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历史文化名人被标签化,比如苏东坡只剩下“旷达”,王阳明只剩下“悟道”。

“名人剧”的文旅化体现了地方文化资源活化的积极探索,但其长远发展仍取决于能否从“借名人引流”走向“以人物立剧”,从文化奇观走向深度的精神表达,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精品。

铁索站了一会儿,手心里全是汗。我想象不出当年那22个人是怎么爬过去的,想不出来,超出我的理解范围。

有一段时间我写不下去了。觉得怎么写都不对,怎么写都轻了。那些苦难,那些牺牲,我这几行算什么呢?跟朋友说了这个困惑。他说,那你别写了,非得写吗?我想了想,还是想写。不是觉得我能写好,是觉得这件事不该被忘掉。诗可能很轻,但记住这件事本身是“重”的。我能做的就是别把这份“重”写丢了。

现在写完了,书要出了。我心里并不踏实。我知道肯定有不足,有的地方写得太用力,有的地方又没写到点子上。但我也知道,我尽力了。

如果翻开这本书的你,读了几页,能停下来想一想——多年前有一群人走了那么远的路,吃了那么多苦,不是为了他们自己——对我来说就够了。

长征胜利九十年了。亲历者差不多都走了。以后的人了解它,只能靠书,靠文字,靠我们这些还在书写的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,也是一个缘分。九十年后还有人写它,还有人读它,说明它确实活着,不只是纸上的。

绩赢得幸福与自由”的前景,优绩不是目的,个人幸福与自由才是目的。而个人幸福与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?那就是消费选择的丰富性、消费档次的提升。

至于时间,人所共知,它不是目标,因为优绩主义作为效率主义的极致状态,是不主张时间不用于创造价值的,空的时间属于浪费。消费主义其实与“工作主义”一体,工作时间用于创造价值,自由时间用于消费,消费是为自己创造情绪价值、为资本创造经济价值。

数字技术为绩效竞争添加了强大的动力。它带来了绩效无上限的梦幻,海量数据、光纤通讯、高速运算、机器智能,一方面刺激面临被机器压制的不甘,显示“人有人用处”;一方面让人与人的竞争更加简明,“智力”的重要性体现在谁会更提问”,从而益加增进智力优越论者的骄傲。

平台经济以低概率的成功者塑造“人人可以靠流量富裕”的假象。数字时间、平台操控、姿态传感、眼球追踪、面部扫描、情感分析、自动应答、文图生成、视频制造、多模态分析等等,同样在发挥着两面性:一方面,它以数量繁多的标准化结果适配了快速获取的心理,消除了人们的耐心;另一方面,机器的“数智革命”及其社会化使用,可能也在开启人的“数愚化”进程,人们因时间挤压而进入一个功能性退化的大脑闲置状态。

人的时间不再主要用于人与人的交往,而是更多被人机界面占据,被人机互动吸纳。这样就生产了更多的数据,数据幻觉不只是因为数据投毒、对话欺骗而形成,也因为真实而不具意义内涵的人机互动产生。绩效的获得更多依靠数字过程,导致一个“数滚数”的资产增值模式,就像金融资本“利滚利”一般。

极致内卷成为优绩主义的必然倾向,最终触发优绩主义的梦魇。时间、身体和精神的消耗逼近极限,可能创造出它的反面,绩效主体崩溃,优绩主义不再能给自己打气输血,“我可以”“我能”“我行”坍塌为“我不想”“我不愿”“我不行”。

绩效主体的崩溃不是自主主体的回归,而是主体的另一种异化,它表明“规训社会制造疯人和罪犯,绩效社会生产抑郁症和厌世者”。